

#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知识话语研究\*

高晓玲

**内容提要**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重要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包括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领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对他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具体学科领域。本文着重考察他的知识话语，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他对认识问题的基本看法。文中讨论穆勒在“总体性知识”和“浅表性知识”之间所做的区分、他的“局部真理”和“多面性”概念，基于此种认识观点提出有别于“职业教育”的“通识教育”理念，以及在柯勒律治影响下提出的“哲学家诗人”这个作为智性权威的角色。如果将穆勒进行简约化的学派归类，将会极大削弱他的思想价值，他的折衷主义和反派别主义体现了他在学科分化趋势下进行的整合性努力。

**关键词**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总体性知识 通识教育 反派别主义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5.01.002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在《论边沁与柯勒律治》中有句广为人知的论断“当代每一个英国人都隐约地不是边沁论者就是柯勒律治论者。”<sup>①</sup>有趣的是，他虽然深受来自这两方面的影响，却拒绝把自己划归其中任何一方。要明确定位穆勒的立场，是相当困难的。在哲学上，他被称为经验主义者；在伦理学上，他被称为功利主义者；在政治学上，他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在社会学上，他又被称为集体主义者。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主义”来为他贴标签，却没有哪一个说法可以完整地涵盖他所有的观点。正如传记作家尤金·奥古斯特所说，穆勒是“西方思想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文艺复兴思想家，非凡地把所有知识作为他的研究领域。他也是现代

世界一位伟大的跨学科研究的智者，在他做出如此出色贡献的各种学科之间建立了联系。”<sup>②</sup>

因此，要想把握穆勒思想的总体特征，我们需要暂时跳出学科划分的窠臼，审视他对认识根本问题的看法，因为无论哪个“主义”都只能揭示关于他的“部分真理”，而非“全部真理”。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他的知识分类方法，梳理他传承自歌德和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作家对于知识本质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基于此种知识观点确立的教育理念，以期对其思想获得更为整体性的理解。

## 一、“浅表性知识”和“总体性知识”

1826年一批辉格党教育改革家在伦敦大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知识话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0CWW012）。

学成立了“有用知识传播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他们通过出版廉价周刊,向社会中下层介绍最新科技成果。这个学会被穆勒挖苦为“无用(Useless)知识传播学会”。<sup>③</sup>穆勒为什么会称其“无用”?1831 年他发表的《时代精神》可以提供部分线索。这篇文章不仅提出了关于维多利亚时代为“转型时代”的著名说法,而且也尖锐地指出了时代问题“这个时代所成就的伟业不过是浅表性知识的传播(diffusion of superficial knowledge)。”<sup>④</sup>从原文的遣词方式可以看出,穆勒矛头暗指“有用知识传播学会”。在他看来,这些所谓“有用的知识”,不过是肤浅的知识,只能提供事实和信息,并不能真正算得上有用。

“浅表性知识”的说法在他 1867 年所做的《圣安德鲁大学就职演说》中再次出现。文中他明确把它与“总体性知识”(general knowledge)区别开来。<sup>⑤</sup>这个区分原为霍埃托利主教提出,穆勒不仅对此深表赞同,而且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更深一层的阐述。他指出,由于各个学科信息的膨胀,科学技术的分支增多,每个人的知识面越来越局限于个别领域,他们所掌握的细枝末节,只能算是“浅表性知识”。穆勒担心,这些过分注重细节和局部的研究不仅使人们的知识面日趋狭窄,也会导致思维方式的偏颇,从而导致人性的狭仄:

这种情况下,精神内部将孕育出与其专业关联的特有偏见,伴随而来的是那些视野狭隘的专家们都丧失理解和评判宏观事物及其根源的能力,并产生一种共同的偏执。我们不得不这么预测:所谓的人性,将越来越因只能熟悉细小的事物而渐渐萎缩下去,一旦面临重大的事物就不能适应了。(《论大学》,24 页)

穆勒在论述中不断重复与“偏狭”有关的字

眼如“infinitesimal, narrow, pervert, dwarf”等,让人想起阿诺德对“内敛时代”(age of concentration)的批评,这种彼此隔膜不断萎缩的思想趋势显然与“扩张开放的时代”(age of expansion)潮流背道而驰。<sup>⑥</sup>

正是出于此种担忧,穆勒倡导一种与之相对的知识——“总体性知识”。他这样界定“总体性知识”:

拥有关于事物的总体性知识是指只了解其主导性真理,要透彻而非粗浅地认识这些真理,以此认识到事物的重要之处,那些次要细节则可以留给有特殊研究需要的人们进行详细考究。(《论大学》,25 页)

那些“次要细节”相当于他所说的浅表性知识,而更具整体价值的“总体性知识”才是穆勒所认为的真正有用的知识。在演讲中穆勒以相当专业的口吻谈到包括古希腊文学、数学、逻辑学、生理学、法学等各个特殊领域的知识,尽管他对每个学科都具备相当专业的认识,却很少沉溺于具体细节的考究,而是随时准备跳出某个具体学科,考察其基本原理,并将其置于人类思想的整体发展中进行思考,他所关注的正是关于事物的“主导性真理”。他所说的“总体性知识”强调不同知识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存在和经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各门学科虽然从不同角度深化了个别研究,却切断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导致了认识的片面性。

穆勒把拥有总体性知识的人称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cultivated intellects),因为他们不仅拥有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而且对其他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足以使他们拥有一种理解力和独立的判断力,不至于盲从某一学派或党派,也不会随波逐流。在他看来:

学习的目的不是掌握一些对将来工作起作

用的知识，而是对关系到人类利益的所有重大问题有所了解……我们的目的是学习对自然和人生宏观的、正确的观点，并在心中牢牢铭记把时间浪费于实际不值得为之努力的琐屑事物实际上也就是怠惰。（《论大学》，26 页）

穆勒之所以强调“总体性知识”高于“浅表性知识”的价值，是与他对人类本身的认识密不可分的。在他看来，人们在成为律师、医生、或者商人之前，首先是“一个人”。这种整体性存在要求人们超越某一具体领域，对现象获得完整统一的认识，而非局部的或片面的认识，他提醒人们，知识具有“多面性”，我们获得的往往不过是“局部真理”。

## 二、知识的“多面性” 和“局部真理”

穆勒经常用“多面性”（many-sidedness）或“半个真理”（half truth）等字眼来讨论知识问题，前者源自歌德的影响，后者则来自柯勒律治。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把柯勒律治关于局部真理的许多名言应用到争论的双方，并应用到柯勒律治本身；而歌德‘多面性’的说法，在这个时刻我最乐意接过来为我所用。”<sup>⑦</sup>歌德把“多面性”作为基本认识原则，在他看来，世界广阔丰富，生活复杂多变，诗人只有拥有多个层面的广博知识才能进行创作出鸿篇巨制。不惟诗人，领袖和政治家也同样需要多面性知识和教养，以避免偏狭的判断。歌德还曾用“多面性”来称赞洪堡的思想，认为他兼具学识和智慧，把他称为可以提供活水的源泉。<sup>⑧</sup>穆勒在歌德的影响下，把“多面性”作为认识原则，并常常警惕思想和判断上的“片面性”（one-sidedness）。1834 年 1 月给卡莱尔的信中，穆勒对自己曾经的“片面性”进行了反思：

我最初的哲学态度是极其偏狭的，这倒并不是出自内心的鄙夷，而是因为理解上的片面性（one-sidedness）：我所看到的是从歪斜不平的镜子中投射出的扭曲影像，是真理的单面而已……现在我已经摆脱了那种偏狭的态度，而且也认识到自己演绎的前提不过是从现实纷繁层面中的一面作出的简单概括而已。因此我后来就试图观察事物的各个层面，让自己了解所有观点，以求通观全貌。有段时间我变得非常包容大度，甚至把片面偏执看作是人类大恶。<sup>⑨</sup>

穆勒这里提到的最初哲学态度可能指自己早期对功利主义的全盘接受，后来的精神危机促使他反观自己的认识模式，并开始警惕所有学说中所包含的可能偏见。正是借助多面性原则，他发现边沁关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快乐”原则存在的问题——只关注了快乐的量，却忽略了快乐的质。他据此修正了边沁式功利主义，并提出了著名观点“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愿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白痴。”<sup>⑩</sup>在 1853 年的《汉密尔顿哲学审查》（*An Examination of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中穆勒也同样以“多面性”为基本认识原则。他强调指出：

所有的知识都具有多面性和差异性：一个事物能为我们所认识，是因为它与其他事物不同，与我们不同，与我们已经认识的他物不同。只有这样我们的头脑才能获得对于该事物的根本真理。<sup>⑪</sup>

这段话不仅强调了知识的复杂性，同时也提出了认识的基本方法：差异辨别法——事物总是在和其他事物的区别中存在，这成为穆勒认识事物、论述问题的基本思路。比如在《诗歌

是什么?》(What is Poetry?)中,他分别比较了四对概念:诗歌与科学、诗歌与叙述、诗歌与描写、诗歌与修辞之间的区别。他并不直接陈明诗歌具有怎样的特征,而是通过比较它与其他体裁的差异,来分别确定诗歌的性质、目的和功用等特点。通过对比差异——说明它不是什么——来确定它是什么。从这个角度看,穆勒可以说是19世纪的结构主义者。他这样的界定方式无疑更加清晰严谨,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事物。

此外,穆勒的《论自由》之所以倡导思想和言论自由,反对趋同,也同样是出于对知识多面性的认识。他意识到,“人民的意志”这个说法往往只是代表多数人或者比较活跃的部分人民的意志,当这多数人的意志被接受成为“集体意见”,也有可能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即以错误的权威观点压制少数个体正确的意见;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双方都正确,却因执着于自己的半个真理而排斥其他真理。<sup>⑫</sup>穆勒指出,只有通过言论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才有可能达成对真理较为完善和全面的认识,而不至囿于自己一方的“半个真理”或者说“局部真理”:

人类的真理并非总是无懈可击的;多数真理都不过是半个真理;除非是对立诸意见经过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较量的结果,不然的话所谓“统一观点”,就没什么可取之处。人类在无力认识真理的所有层面时,意见的分歧并非坏事,而是好事。<sup>⑬</sup>

他在《论边沁与柯勒律治》中便分别审查了两方的“半个真理”。一方面,他分析并肯定了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和逻辑分析方法对于思想史的重要贡献,认为边沁作为一名哲学改革家,具有大胆的怀疑精神,而且他独特的细节分类方法和精准的思维表述方式,适用于经济、政治或道德哲学研究,值得充分肯定;另

一方面,他也尖锐地指出了边沁哲学的问题:缺乏整体思考的力量,也缺乏想象力,对于无法置于经验框架的知识,一概不予考虑:

边沁对所有其他思想流派的轻蔑,他那指望完全由自己的思想和相似的思想提供的材料来创造一种哲学的决心,是他作为哲学家的首要失职。其次,是作为普遍人性代表的他自己思想的不完整性。他对人性的许多最天然、最强烈的情感毫无同情感;他对人性中许多重要的经验一无所知;他由于想象力的缺乏而无缘于一种思想理解另一种不同思想的能力,也无缘于进入另一种不同思想情感的能力。(《论边沁与柯勒律治》,24页)

在穆勒看来,边沁最主要的问题便在于欠缺包容性和开放性,执着于自己的“半个真理”,而排除了另一半,因理性分析而否定了情感和想象力,因此,穆勒经常把边沁称为“半个思想家”(half thinker),称其观点为“零碎真理”(fractional truth)。

实际上,穆勒所发现边沁的问题也正是他自己经历过的问题。穆勒是受父亲家庭教育长大的天才。在穆勒的记忆里,父亲对热烈的情感表达总是嗤之以鼻,表现出“极度的蔑视”和“不满”;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温情。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穆勒的文风总是冷静持重,极少个人感情色彩。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天才人物会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产生怀疑,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尽管后来借助华兹华斯的诗歌,穆勒逐渐走出低谷,但这一经历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一个转折点,使他能够全面地看待人性的精神需求,并在柯勒律治身上看到一种与边沁制衡的力量,因为他“更倾向于辨析那些现有学说和制度所忽视的真理”。他认为,虽然柯勒律治被

看作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所揭示的却是那些被保守主义者们遗忘，流行的自由主义学派闻所未闻的知识（《论边沁与柯勒律治》，4-5页，121页）。

但同时，他也提醒读者不能因此便全盘否定边沁“如果因为他（边沁）忽略了真理的另一半，我们就拒绝他那一半的真理，就会犯下与边沁一样的错误，但我们却没有他拥有的借口。”（《论边沁与柯勒律治》，27-28页）如果因为真理的相对性而对其全盘否定，或许会导致更大的问题。他指出，因为对事物不完整的、片面的观念会导致人们过分执着于自己一方的真理，而忽略和否定其他真理，这才是人类进步最大的障碍。因此在《论自由》中穆勒一方面主张言论和思想自由，鼓励辩论和对话，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警惕话语之间的彼此压制：

真正可怕的并非是各个局部真理之间的激烈冲突，而是一个局部真理对其他真理的压制。但凡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意见，情况就总有希望；一旦人们只偏执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本身由于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sup>⑩</sup>

穆勒以中世纪宗教法庭对无神论和宗教异端的迫害为例，说明了局部真理变为谬误的可怕后果。此外在评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时，他一方面赞赏美国正在进行的民主制度建设，但同时也和托克维尔一样担心民主社会中多数人的暴政问题。在评论孔德和实证主义的问题时，穆勒同样也有意识地践行自己提出的原则。他指出“孔德掌握了一半真理，而自由派或革命派掌握了另一半，两方都得见对方所未见，从而形成排他性观点，由此得出的结论在对方看来荒谬绝伦。”<sup>⑪</sup>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穆勒一方面承认孔德对自己写作《逻辑学

体系》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在《孔德与实证主义》中明确指出了其思想缺陷。对穆勒来说，只有充分考虑到事物的各个层面，充分考察每一半真理，才有可能达成“全面真理”：

人性和生活的领域可以无尽地挖掘，或者在无数个方向上挖掘，每一块土壤被翻起之前，工作都是不完美的；除非结合了所有局部真理的观点，否则就不可能有全面真理，所以，在完全认识到每一局部真理的作用之前，也不可能有全面的真理。（《论边沁与柯勒律治》，27-28页）

### 三、总体性知识与通识教育

既然知识是多面性的，需要考察各个局部真理才能获得全面真理，那么就要求学习者不拘于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而应具备一种更加宏观的认识和思维能力。1867年的《圣安德鲁大学就职演说》可以被看作是穆勒大学教育观点的集中阐述。

穆勒对大学职能的看法与阿诺德的文化观不无契合之处，他指出，“大学是为了把人类积累下来的知识宝库尽其所能传授给下一世代。所以，大学在涉及道德和宗教问题上，要把整个人类的、各个国家的，或者最善的和最贤明的个人的观点传播开去，这也是大学必不可少的最重要功能的一部分。”大学的职能不仅仅是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德性品行的教化：“（大学）不仅是让我们成为对人类有实际作用的人，还能提高人本身的品性——达到使得人性更加有用和高贵者两个方面的目的。”（《论大学》，70-71页）真正兼具了知识和品性的人才能被称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这在某种意义上与阿诺德所说的“最优秀自我”不谋而合。

根据这一原则，穆勒把大学教育和职业教

育进行了明确区分:“大家都知道大学不是进行职业训练的场所,讲授人们为了解决生计的特定技能所必要的知识不是大学的目的。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熟练的律师、医生和工程师,而是培养有能力、有教养(capable and cultivated)的人才。”(《论大学》,15页)何谓“有能力、有教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思想的训练、一种习惯的培养”,依靠这种能力和教养,他就能自主学习并掌握各种技能,而且能够在没有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处理各种不同情况。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就有赖于“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个概念成为他教育观的核心内容。<sup>①6</sup>

穆勒所倡导的“通识”教育,呼应了前文提到的“总体性知识”,以区别于过分精尖的专业化或职业化的教育模式。穆勒认为,他们在大学应该学习的不是专门知识,而是能正确利用专业知识的方法、以普遍教养之光来诱导专业领域技术正确的发展方向。诚然,即使没能接受通识教育的人也能成为能干的律师;但若成为贤哲律师(philosophic lawyer),即假如你希望并非只是通过背诵把详尽的知识填塞到头脑里,而要追求掌握事物的原理的话,通识教育就是必不可少的(《论大学》,16页)。

他所说的通识教育,包括三个方面:智性教育、道德教育以及审美教育。智性教育是指传递知识和获得知识能力的培养;道德教育则培养良知和道德能力;而审美教育则指情感教育和美育,需要依赖诗歌和艺术来完成。<sup>①7</sup>因此,针对当时激烈的科学与人文教育之争,他提出了自己的折衷立场:

说实在,我认为关于应该教授古典科目还是科学的争论,与人们围绕绘画应该学习素描还是彩色画的讨论没有什么区别,或者用一种更随意的说法,这一问题就像是裁缝应做上衣还是做裤子一样。我的回答是:两者都需要。一种好的教育难道不应

该包括文学和科学两部分吗?科学教育教我们如何思考,而文学教育则教我们如何表达思想……一个人如果欠缺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那么此人在人性上必定贫弱、畸形、发育失衡。(《论大学》,20页)

穆勒之所以同时强调科学与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是和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分不开的。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对他的教育并不缺乏智性和道德教育的成分,然而欠缺了审美和情感方面的教育,这不仅造成了他早年的精神危机,也促使他在晚年反省自己的学习生涯。

穆勒的《自传》也可以被看作穆勒的教育历程和反思。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整部自传中穆勒24岁之前的生活占据了主要篇幅,即七章中的五章,而从1830年以后的40年则在其余两章中匆匆带过。他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我的思想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早期教育在他思想发展中的分量。我们再来看前五章,其中一章到四章都是关于老穆勒的教育和影响,五章的重点则是众人所知的精神危机。如果再梳理一遍小穆勒的教育,就可以看到超前家庭教育的传奇:3岁学习希腊文、8岁就开始学习拉丁文、几何学和代数学,12岁开始系统学习经院派逻辑学,13岁学完政治经济学全部课程,14岁前往法国,研究过化学和植物学、15岁研究心理学和罗马法,16岁发表《交换价值》,并筹建功利学会,17岁与父亲和边沁一起创建《威斯敏斯特评论》,同年进入东印度公司工作……然而对于这段常人无法企及的辉煌经历,穆勒并不感到特别自豪。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比同龄人优秀,只是因为自己的教育早开始了25年。

穆勒的早期教育不仅涵盖了广泛的知识层面,而且由于老穆勒的悉心指导与逻辑训练,穆勒比同龄人更早获得了相当成熟严谨的思维能力。这一点可以从他跨越不同领域的专业论

著和滴水不漏的行文风格中窥见一斑。老穆勒不仅注重智性教育，在道德教育方面也非常用心。用穆勒自己的话说，父亲是“以‘苏格拉底美德’作为教诲我的道德典范”：

这就是正义、克制（这一点他做广泛的运用）、诚实、坚忍、有吃苦耐劳的决心、关心公益、根据人的优点评论人、根据物所固有的效益评价物，关于生活则要求努力奋斗、反对贪图安逸与懒散。（《自传》，36页）

晚年撰写自传的穆勒尽管依旧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但同时也痛切地意识到这种教育的不足之处，他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情感教育的缺失。他的童年几乎没有和同伴的嬉戏时光，父亲也尽量使他避免与同龄人交往以防不良影响。和兄弟姐妹共处的短暂时光也是以小老师的身份不太情愿地教他们拉丁文和历史；他几乎没有儿童玩具或儿童读物；老穆勒在他面前很少掩饰自己对情感和想象力的轻视和鄙夷。穆勒虽然严谨却是“干巴巴的”文风与此不无关联。穆勒这样总结“在他（父亲）与孩子们的道德关系中主要缺少的成分就是温情。”

这也成为他1826年精神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他意气风发地投入社会改良活动时，突然陷入了崩溃状态。当他假设自己所有人生目标都完全实现时，问自己“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而意识中的“不！”完全否定和颠覆了他的精神基础。穆勒晚年反思自己的问题时，意识到这是由于智性教育所导致的情感能力的丧失“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自传》，87页）尽管他最终借助华兹华斯的诗歌

摆脱了抑郁，重新开始正常生活，但也开始意识到智性教育的局限以及情感教育的重要性：

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或低估我以前发觉的那一部分真理，我依然承认知识教育的重要性，绝不否定分析的力量与作用是改进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我想：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在程度上必须加以纠正，除它之外还要结合其他种类的教育。各种能力之间保持一定平衡现在在我看来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感情的培养成为我的伦理和哲学信念的重点。我的思想和志趣越来越重视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任何事物。（《自传》，88页）

穆勒对“感情培养”的需求最终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得到了满足。他发现，华兹华斯自然诗的治愈功效不仅仅在于其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在动人的美景下含蓄着感情，蕴藏着由感情渲染的思想”（《自传》，91页）。华兹华斯诗歌所激发的想象力和感情中使他意识到一种与智性知识同等真实的知识。这极大弥补了穆勒成长过程审美和情感体验缺失的遗憾，也使得他的诗歌成为穆勒的“感情培养剂”。

1826年的危机促使穆勒重新思考文学本身的价值，以及想象力和情感在人性全面发展中的作用。1828至1837年间他连续写作了多篇诗歌评论，比如《诗歌是什么？》、《两种诗歌》、《评布朗宁的〈波琳〉》、《丁尼生诗歌评论》等。他一方面强调诗歌应该是诗人自己感受和思想的真诚表达，另一方面也强调诗歌的道德和社会价值。他认为，诗歌能够唤醒人们对崇高思想的共鸣，而且也能够抚慰人们的灵魂，正是这样一种力量使诗歌具有了社会整合作用。<sup>⑧</sup>穆勒中后期的思想和论述中展示出一种动态的平衡：不断寻求智性和情感之间的均衡与协调。在评价自己所说的“生平最

宝贵的友谊”也是后来的妻子泰勒(Harriet Taylor)时,穆勒把各种能力的均衡发展作为对她的最高评价。“她的感觉和思维能力上,加上感情和想象力的天赋,使她适于成为一位尽善尽美的艺术家。”(《自传》,112页)

如果说,华兹华斯启发了穆勒对情感和审美教育关注的话,那么柯勒律治则在思维方式和认识原则上对穆勒产生了全面和深远的影响。

#### 四、柯勒律治的影响与“哲学家诗人”

对于浪漫主义诗歌原则,读者往往只强调华兹华斯所说的“强烈情感的自发涌出”,而忽略了他的后半句“在沉静中回忆起的情感”,而后者才是穆勒认为华兹华斯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这是“由感情渲染的思想”。穆勒虽然借助华兹华斯矫正自己过分强调分析的习惯,但他并未走向另一极端,而是试图在理性与感性、智性与情感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说是华兹华斯为穆勒的精神危机提供了良药的话,那么柯勒律治为穆勒后来思想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如评论家威利所指出的,“穆勒自己是按照18世纪模式培养长大的,自然能够了解自己所处传统的片面性,因而从柯勒律治那里看到了必要的矫正,由此不仅可以看出他思想开明包容,而且也可以看出柯勒律治影响之深远。”<sup>⑩</sup>

如前文提到的,穆勒坚持知识的多面性,总会充分考虑各方局部真理,力求避免一己偏见。在《论边沁与柯勒律治》中,尽管重点分析两方的差异和歧见,但同时他也强调了两者的共通或互补之处,如“他们两位的作品中都包含着对自己一方身陷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的严肃反省”,“(他们都)认识到所有其他的哲学必须来自心灵哲学”:

结果他们最终发现彼此不是敌对的,而是

互补的。他们的哲学方法,同样可以说,虽然不同,但都是合理的逻辑过程。他们在每一方面都是各自的“对应补充”:各自的强项对应着对方的弱项。任何人只要掌握了两者的前提并结合了两者的方法,就掌握了那个时代全部的英国哲学。(《论边沁与柯勒律治》,63-64页)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尽管穆勒力求客观中立,他仍然显示出微妙的倾向性。读者会发现,他在论述方式上接受的是边沁的影响——力求精准确凿,对每个问题逐层分析,点明要义,然而在主导思想原则上则主要源自柯勒律治的影响。前文所论及的“半个真理”便是借用柯勒律治的概念。

柯勒律治的哲学或神学论述中经常会出现对“半个真理”或“局部真理”的说法,这可以被看作他认识方法的主要特征。他在1831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如果我必须把我的思想称为体系的话,那么它不过是在试图让所有的知识获得和谐统一。它并不与其他体系构成对立,相反,它展现出每个体系中真理的一面,而且也展现出那些各自为真理的部分如何又变成了谬误——因为它们只是局部真理(half the truth)。我努力把真理的各个割裂碎片拼接起来,使之形成一面完美的镜子。我想要让每个派系都意识到,我充分理解并准确领会了每个体系的内涵,但同时又将其置于更高的视野,使其得见原本位置,然而又在新角度光照下、在不同的关系中再次审视自己,从而不仅承认自己真理的局限性,也能够说明为何如此。<sup>⑪</sup>

柯勒律治的哲学和神学研究大致上都依据这一原则。比如在讨论哲学论战时,他这样写道:“唯名论和实在论是人类思想中最大也是最重



要的纷争。它们都正误参半。它们各执真理一端，却因为前提太低，都无法洞见全部真理。”<sup>②</sup>在批评洛克的思想时他指出，洛克的思想基础当然不可反驳，但是他的谬误在于“把部分真理当作是全部真理。似乎观察自然产生观念，但观念本身是如何产生的，这个过程我们无从得知”。<sup>③</sup>柯勒律治的神学研究中也非常警惕局部真理的问题。“教条神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局部神圣真理变为可怕的谬误，正是因为人们把这局部真理误认为全部真理。”<sup>④</sup>

穆勒几乎阅读了柯勒律治所有的作品，而且拜访过柯勒律治，和柯勒律治信徒斯特林也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穆勒和柯勒律治一样，意识到局部真理之间互相压制的可怕后果，因此他们都特别注意吸收不同思潮的部分真理，最大限度地避免党派或学派之见。

如果说《论自由》中穆勒倡导多元化思维反对趋同的话，那么《时代精神》中他忧虑的则是另一个极端，即“智性的无政府状态”（intellectual anarchy）。穆勒担心因话语的混杂而导致思想界的混乱无序。他指出“在转型时期，受教育人士之间的分歧消解了他们的权威，而未受教育的人们则对他们失去了信任。大众失去了向导。当那些未曾在任何知识领域进行过全面研究的人试图自行细节判断时，整个社会充满了谬误和危险。”<sup>⑤</sup>在穆勒看来，这才是最严重的时代问题，当务之急并非是如何向每个人普及浅表性知识，而是如何确立“智者的权威”，或者说如何让“最有教养的”小众为社会思潮指引方向。其实，不止是穆勒，很多同时代思想家都持有同样的忧虑，也推出过各自的解决方案：阿诺德把“文化”和“最优秀的自我”作为对抗“无政府状态”的力量；卡莱尔则把“引领方向”的权威角色交给了能够洞见神圣理念的“英雄”；而穆勒所说的“智者”拥有一种更为温和平衡的力量，他有时称之为“哲学家诗

人”——“能够平衡智性力量与感受力的人”。<sup>⑥</sup>这一概念同样源于柯勒律治的影响。

柯勒律治在《文学生涯》中常常把诗人与哲学家的身份融为一体。“每一位伟大的诗人，必然同时也是一位深刻的哲学家。他能够深刻洞见已知事物的生命和灵魂——而且对其有种特别的掌控力。”<sup>⑦</sup>穆勒在评论丁尼生的作品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每一位伟大的诗人，每一位对人类产生过广泛持久影响的诗人，都必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必定有一种他不称之为哲学的哲学；他的思想不仅仅来自于被动的感受而且源自沉思、观察、分析和综合。”<sup>⑧</sup>他早年曾盛赞过雪莱的诗歌，后来则看到了他的不足，把他称为“半个诗人”（half-poet）。穆勒认为雪莱过分倚重主观甚或古怪的素材创作，很难获得广泛共鸣，这归结于他智性修养的缺失。穆勒指出，越强烈的情感越需要强大的智性支撑，就如同船越大航行中就需要更多压舱物一样，一旦由于个人疏忽或者不良教育而缺失了这种支撑，那么就会像大船沉陷越深一样，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sup>⑨</sup>

## 五、折衷主义或反派别主义？

穆勒不仅在论述中依循真理多面性的原则，而且据此行动。他曾于1825年和朋友一起成立“辩论协会”（Debating Society），旨在通过哲学或政治辩论推进真理。但是1829年他正式退出了协会。根据传记作者威廉·托马斯的记载，这是因为穆勒意识到辩论本身并不能推进真理：

这只是一场修辞学意义上的论战，辩论者不得不极力歪曲相互的观点……在他看来，最好的也是最诚实的做法应该是撇开各种理论的标签，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标签背后的真实观点，通过朋友间的有节制讨论来推进这些观点，而避免辩论协会的那种虚假的论战。<sup>⑩</sup>

穆勒从此以后一再否认自己是边沁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或者追随任何其他所谓的“主义”。他在自传中写道,“如果要问我拿什么哲学体系来替代我已经放弃的政治哲学,我不得不说,没有体系,只有一种信念:真正的体系应该是比我以往所了解的任何体系都更为复杂、更为多面”(《自传》,98页)。可以说,穆勒从来没有停驻在某个封闭的体系上自足,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动态的微调过程。他在晚年总结“当我学到一些新的理论时,决不就此停顿,一定要调整它与我旧有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切实地确定在修正或取代我的旧理论中它的作用必须发挥到何等程度。”(《自传》,95-96页)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常常被评论家们被称为“折衷主义”(eclecticism)。<sup>③</sup>评论家特科把“折衷主义”确定为穆勒思想的主要特征,并指出:

他相信,只有把各对立派别的局部真理综合考量,才能得出整体真理,这便是他折衷主义的基础,也正因为这一点,才有了他作品的创见、价值和纷争。尽管他后来纠正了自己对派别主义的过分反应,但并未完全放弃关于局部真理互相补充的观点。<sup>④</sup>

不过穆勒自传的编者哈罗德·拉斯基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穆勒,否认折衷主义的说法:

在狭隘教条盛行时期,他迥然不同于折衷主义的天性,这种天性正是当时最有影响人物的特征。穆勒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强烈批判民主的缺陷。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但是没有人像他那样憎恨过度的放任主义。正如卡莱尔清楚看到,归根结底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是没有人比他更无情地揭露教会主义的危

害与荒谬。他最关心的是提高人的精神。说到底那就是他写文章的根源。(《自传》序言,5页)

事实上,两种观点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取了折衷主义的不同含义而已。穆勒之所以提出折衷的和整体性的认识方式,主要来自于他对英国问题的认识。在他看来,英国人的思想过分注重狭隘的各自孤立的具体事物,而缺少一种统领性的普遍原则;而英国年轻人则只关注狭隘的自然科学,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关心人性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因此他的大学理念倡导把学生从个别、微观的学科中解放出来,教他们从整体上审视科学和文化,并能够看清不同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论大学》,112页)。

笔者认为,最能准确描述穆勒立场的应该是“反派别主义”(anti-sectarianism)——反对任何以学派或教派名义的排他性思想或行为。穆勒在经历了精神危机后,把自己过去的立场称为“宗派主义的愚蠢”(sectarian follies)。他在阅读孔多塞的《杜尔阁传》时读到杜尔阁“认为各种宗派都是有害的”,因此与百科全书派人士保持距离,这些都给穆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自此不再称自己为功利主义者,而且也开始有意识地避免话语中用“我们”之类的集体称谓以避免无意识的宗派主义。尽管他在《自传》中承认自己的思想深处的宗派主义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才得以摆脱,但读者在他的政治学 and 经济学批评已经明显意识到了这种反对派别的态度。穆勒在 1835 年 5 月 26 日给马蒂诺(James Martineau)的信中写道,《威斯敏斯特评论》其中一个宗旨便是摧毁宗教上的教条主义,鼓励大胆理性思维。<sup>⑤</sup>

总体上看,穆勒实践了自己提出的知识多面性和总体性原则,他不仅在不同知识领域获得了独特洞见,而且为在各学科之间建立关联,进行了整合性努力。可以说,他是在相互冲突

的思维模式中不断寻求一种综合与调谐。这不仅是他个人，也是维多利亚时代重要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柯勒律治力求达到使“两个极端相遇”；阿诺德尝试在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之间找到立足点；乔治·爱略特通过小说寻求情感与理性的结合点……<sup>③</sup>穆勒对于现代人的启示，与其说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或者伦理学等专业领域，不如说是在认识的根本原则上。我们不妨回到尤金·奥古斯特对穆勒的评价“对一个被知识的多样性和狭窄的专业性围绕的世界来说，穆勒保持了综合智力的有益典范。”<sup>④</sup>

#### 注释：

- ① 约翰·穆勒 《论边沁与柯勒律治》，白利兵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版，64 页。以下引用该版本时，只在正文中给出书名，并随附页码。
- ② 尤金·奥古斯特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自由的心灵》，转引自苏珊·李·安德森 《密尔》，崔庆杰，陈会颖译，中华书局 2014 版，1 页。本文涉及相关文献标题中的“密尔”与“穆勒”为同一人名不同译法，为方便读者，正文中统称为“穆勒”。
- ③ John Stuart Mill, “Letter to Gustave d’Eichthal, 15 May 1829”, *The Earlier Letters of John Stuart Mill, 1812-1848*, ed. Francis E. Mineka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63), Vol. 1, 33 页。信中添加 “the Society, which Thomas Love Peacock nicknamed the ‘Steam Intellect Society,’ had been founded in 1826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enry Brougham to publish in inexpensive editions works on science, history, economics, ethics, and philosophy”。这个运动在美国也广泛开展，同样也遭到了类似的挖苦，比如 1840 年《美国杂录》甚至以“无用知识传播和人类理解混杂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less Knowledge and the General Confusion of Human Understanding）的名义发表年会报告。美国作家梭罗在《学习的方式》（*Ways of Learning*）中提议成立“有用无知传播学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Ignorance）。
- ④ John Stuart Mill, “The Spirit of the Age”, *Victorian Essays*, ed. Gertrude Himmelfarb (New Haven: Yale UP, 2007), p. 55.
- ⑤ 约翰·密尔 《密尔论大学》，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24-25 页。以下简称《论大学》，引文页码随正文标

出，不再另行作注。原译为“一般教养知识”，此处为突出与“浅表性知识”对应的含义，故改译为“总体性知识”。穆勒于 1867 年被圣安德鲁斯大学选为名誉校长，就任典礼上，他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系统地论述自己的大学教育观。

- ⑥ 关于“扩张的时代”概念，参考马修·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修订译本），韩敏中译，三联书店 2008 年版，19-20 页。
- ⑦ 约翰·穆勒 《约翰·穆勒自传》，吴良健、吴衡康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99 页。文中均简称《自传》，引文页码随正文标出，不再另行作注。原译文中“科尔里奇”改译为更为通行的译法“柯勒律治”；“一半真理”改译为“局部真理”。另相关内容可参见 Dennis L. Soper, *Goethe Contra Newton: Polemics and the Project for a New Science of Color*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p. 92, 156, 189.
- ⑧ Johann Peter Eckermann, *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trans. S. M. Fuller, Kila (MT: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8), p. 44, pp. 142-3, p. 174.
- ⑨ John Stuart Mill, “Letter to Thomas Carlyle, 12th January, 1834”, *The Earlier Letters of John Stuart Mill, 1812-1848*, Vol. 1, p. 33.
- 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功利主义》，叶建新译，九州出版社 2007 年版，25 页。
- ⑪ John Stuart Mill, *An Examination of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 (London: Longman, 1865), p. 48.
- ⑫ 约翰·穆勒 《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4-5, 66, 61 页。
- ⑬ 约翰·穆勒 《论自由》，66 页。
- ⑭ 约翰·穆勒 《论自由》，61 页。
- ⑮ John Stuart Mill, *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 5th edit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07), p. 97.
- ⑯ 关于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之间的异同，参见宋晓平、梅红 《Liberal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以及素质教育》，载《中国高教研究》，2010 年第 1 期，30-34 页。文章指出，“liberal education”是当前多数美国大学都认同并实施的一种教育理念，涵盖了教育的总体，它注重的是对个体的自由心智（Free Mind）的启发与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心智教育可以体现在大学所有的课程中，即使是专业课教育中同样也可以体现心智教育理念和要求。此外为了实现心智教育的目的，学校也可以专门安排相关的课程。General Education 是 Liberal Education 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为了实现心智教育目标而需采取的一种目前普遍认可的教育教学手段，关注的是相关的课程体系的设计与编排，构成了本科课程体

-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却不包含于专业课程中。目前美国大学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大致可以分为“分类必修”、“核心课程”以及“自由任选”三大类。
- ①⑦ 穆勒关于审美和艺术方面的观点, 可参见 Ben Eggleston, Dale Miller, David Weinstein,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Art of Life* ( New York: Oxford UP, 2011 ), 13-16, 54, 146-154 页。
- ①⑧ John Stuart Mill, “Thoughts on Poetry and Its Varieties”, in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874 ), Vol. 1, pp. 89-120.
- ①⑨ 转引自 Basil Willey, *Nineteenth-Century Studies* ( New York: Columbia UP, 1949 ), 12 页。另参见 Nicholas Capaldi, *John Stuart Mill: A Biography* (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4 ), 96-100 页; Christopher Turk, *Coleridge and Mill* ( Aldershot: Avebury, 1988 ); 刘耀辉 《论柯勒律治对 J. S. 穆勒的影响》, 载《兰州学刊》2007 年第 7 期, 39-41 页。
- ②⑩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able Talk*, recorded by Henry Nelson Coleridge, ed. Carl Woodring ( London: Routledge, 1990 ), Vol. 1, pp. 248-249, p. 95.
- ②⑪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able Talk*, Vol. 1, p. 95.
- ②⑫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ids to Reflection*, ed. John Beer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1993 ), p. 79.
- ②⑬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Notes on Donne”, *The Literary Remain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 Henry Nelson Coleridge (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1838 ), Vol. 3, p. 98.
- ②⑭ John Stuart Mill, “Spirit of the Age”, pp. 57-58.
- ②⑮ John Stuart Mill, “Thoughts on Poetry and Its Varieties”, in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Vol. 1, p. 119.
- ②⑯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 Henry Nelson Coleridge (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3 ), Vol. 3, p. 381, p. 383, p. 473.
- ②⑰ John Stuart Mill, “Tennyson’s Poems”, *The London and Westminster Review*, 25 ( 1835 ), pp. 402-435.
- ②⑱ John Stuart Mill, “Thoughts on Poetry and Its Varieties”, in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Vol. 1, 119 页。阿诺德对雪莱也曾做过类似评价, 参见 Edward Alexander, *Matthew Arnold and John Stuart Mill* (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155-161 页。
- ②⑲ 威廉·托马斯 《穆勒》, 李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47 页。
- ③⑩ 如孔凡保 《折衷主义大师——约翰·穆勒》,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195-199, 209-911 页。
- ③⑪ Christopher Turk, *Coleridge and Mill*, pp. 214-215.
- ③⑫ John Stuart Mill, “Letter to James Martineau, May 26, 1835”, *The Earlier Letters of John Stuart Mill, 1812-1848*, p. 476.
- ③⑬ Basil Willey, *Nineteenth-Century Studies*, 28, 216 页。评论家爱德华·亚历山大指出, 阿诺德和穆勒一样, 认为现代诗人的核心问题便是, 如何在思想和情感之间取得平衡, 参见 Edward Alexander, *Matthew Arnold and John Stuart Mill*, pp. 153-157.
- ③⑭ 尤金·奥古斯特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自由的心灵》, 1 页。

(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专业英语二系 )  
责任编辑: 林丰民

## 英文提要

### **Addison Gayle: The Exponent and Defender of the Black Aesthetic**

**WANG Yukuo**

The Black Aesthetic , spurred by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Black Arts Movement , flourished in the early 1970s , and has produced an impact on various black American writers and critics. As the editor of *The Black Aesthetic* , Addison Gayle inherits the past tradition and breaks new grounds for the future; his advocacy of the black aesthetic maintains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academic value , providing rich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Black American writings and criticisms.

### **John Stuart Mill's Discourse of Knowledge**

**GAO Xiaoling**

As a seminal Victorian intellect , John Stuart Mill exerted widespread influence over diverse fields , such as politics , economics , and ethics. Mill studies have been mainly concerned with his contribution in particular disciplin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Mill's discourse of knowledge rather than professional details in order to obtain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his thought. Taking “many-sidedness” and “half truth” as his basic principle , Mill differentiated “general knowledge” from “superficial knowledge”. Based on the former he advocated “general education” befor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philosopher-poet” as the intellectual authority. Reductive sectarianism fails to show Mill's mental strength. Eclecticism and anti-sectarianism demonstrate his synthesizing efforts in the sweeping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 **Jane Austen's Biographies: Recent Development**

**GONG Yan**

Earlier major biographies of Jane Austen were written by her family members , the main outlines of the novelist's life and personality being all there in Austen-Leigh's *Memoir*. Deirdre Le Faye's *A Family Record* came out in 1989 , a most meticulously accurate account , making not only the use of family papers , but also drawing on research of her own into parish records and county archives. Since then several more full-scale biographies have appeared , either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inclusive and all-embracing social history or turning to literary psychoanalysis for a much less conventional figure of Jane Austen. With the burgeoning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 her current biographers are juxtaposing novel-reading ,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 presenting a more lively version of Jane Austen , and producing a variety of invaluable appreciations of her fictional world.

### **Back to the Center: The Ostensive Sign and New European Fiction of Gender**

**XUE Yuan**

Poststructuralists are often considered to be “destroyers” who destruct but do not construct. They